

北伐期間地方社會的革命政治化*

林志宏**

本文以「革命政治化」為面向，探究北伐時期社會基層的影響和心態。過去相關討論均強調國民革命軍北伐勝利，得自政治口號和主義宣傳的因素，此處則進一步分析其中錯綜複雜的關係。毫無疑問，政治語言和革命儀式是最先吸引社會民眾參與革命活動的原因；隨著軍事行動的深化，北伐軍撼動了基層社會宗教和信仰，使得人們普遍流傳「黨軍可愛，黨人可殺」的說法。為了能夠得到更多支持的力量，北伐後期國民革命軍開始調整策略，容納不同的「革命」勢力，以致後人有「軍事北伐，政治南伐」之譏。

這場高舉「革命」旗幟的軍事行動，讓「革命」成為新的社會現象，每個人在日常生活裡都必須面對和實踐的準則。至於國共雙方也從北伐經驗裡，各自認識到和如何運用群眾運動的力量，為日後「黨治」鋪下基礎。

關鍵詞：北伐、革命、政治文化、主義崇拜

* 本文最初於「第七屆史學與文獻學學術：社會史研究之新視野」研討會(臺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系，2009年5月22-23日)上宣讀，由衷感謝評論人劉維開教授賜教，兩位審查人並提出有益的建議，謹致謝忱。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聯絡地址：台北市11529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30號(No. 130, Sec. 2, Yen-chiu-yuan

一、前言

1926年7月9日，廣州的國民政府宣布誓師「北伐」。緊接著兩年半期間，國民革命軍兵分三路進行，在以寡擊眾的懸殊逆境中，所到之處勢如破竹，結果順利在短期內達成形式上的全國統一。如此令人意外的結果，固然有許多成功的因素存在，但時人均不約而同指出受到明確的軍事目標所致。¹尤其得自政治口號和主義宣傳的推波助瀾，²這項軍事行動不僅徹底改變了此後中國的政局，也對社會上思想文化造成若干深遠地影響。

為什麼主義和黨等新的宣傳事物，結果竟能撼動了整個中國政治和社會？許多學者特別注意到事件本身帶來思潮的變化。像是林霽(Arthur Waldron)強調「五·卅」慘案的作用，認為1925年的這一事件，無疑開啟一個新的時代來臨，標示中國新舊思潮的分水嶺，且宣告民族主義運動和新興政治力量的崛起。因為從性質和意義的層面觀之，「五·卅」帶來非惟是一般基層民眾所展現的愛國情緒而已，也象徵既存的軍—紳權力結構，最後面臨分崩離析之境；由於權力象徵和思想的真空，遂使「主義」得以竄起，吸引普羅百姓，加上民族情感的政治性運用，促使了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形成。因此，受到先前「五·卅」慘案所影響，「北伐」軍事活動得以加速而順利開展，成為1920年代中國邁向現代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的道路上的「型變之鏈」(the chain of transformation)。³當中最顯

Rd. Taipei, Taiwan (R.O.C.) 11529)

¹ 曾經擔任軍事方面顧問的俄人說到：國民革命軍之所以成功，關鍵在於確立反帝、反軍閥的政治目標，對軍隊士氣提高有所助益。這可能也是當時許多外國人在華共同的觀察。譬如向來立場「保守」的《華北每日新聞報》編輯戈林，評論過國民革命軍成功因素得力於反軍閥的宣傳；社會學家安德爾森指出北洋部隊軍紀廢弛，凡駐紮過的地區居民無不痛恨，但廣東部隊卻極力維繫軍民關係，相反地極受歡迎；丹麥記者尼森則是強調政治宣傳和蘇聯顧問的支援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以上俱見孟·伊·嘉珊寧，《加倫將軍總顧問室》(臺北：國防部情報局，1977)，頁168-170。

² Donald A. Jorda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76), 231.

³ Arthur Waldron, *From War to Nationalism: China's Turning Point, 1924-192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xix+366.

著之處，是整個國家體制以全新的面貌呈現，隨之而來的是社會、外交、文化及思想各層面歷經徹底的改造。所有上述的各項活動都與軍事進展互為表裡，政治面則是體現了總體性結構的轉變。⁴

這樣的一個社會現象，使得身歷其中的人們開始察悟到前所未有的歷史變化。當北伐進行尚還不滿一年之際，知名的文史學者王國維(1877-1927)即以投湖自沉明志，致使各方議論紛紛。在他的遺囑內，寫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等語，引來諸多揣測。可是換個角度來想，「世變」兩字母寧也點出眾人心態，並做出最貼切的表達，可說講出了活在當下人們共同的話語。所以，每個人在猜想王氏的死因同時，其實不妨可以解讀為自我對現實時勢的關懷和投射。即便是一向支持和嚮往北伐行動的人，對「世變」的實際結果也是五味雜陳，未必稱心如意。有的人眼見勝利在望，反倒心存悲觀，情況好比茅盾(沈雁冰，1896-1981)的心聲一般：

在以前，一般人對於革命多少存點幻想，但在那時卻幻滅了；革命未到的時候，是多少渴望，將到的時候是如何的興奮，彷彿明天就是黃金世界。可是明天來了，並且過去了，後天也過去了，大後天也過去了，一切理想中的幸福都成了廢票，而新的痛苦卻一點一點加上來了。那個時候每個人心裡都不禁嘆一口氣：「哦，原來是這麼一回事！」⁵

那麼，既然有類似王國維那般深懷恐懼、以死應對世變新局的人，又有對革命事業抱持失望的茅盾，我們不免要問：無論接受與否，在如此意見不一的中國社會裡，黨和主義等「新宣傳」究竟是如何來推展，進而促成北伐的成功？毫無疑問，在「革命再起」的口號和風潮下，⁶重新定義「革

⁴ 論者便說：「北伐不單純只是一項軍事上的行動，除軍事外，尚有政治、外交、社會等活動，而這些活動與軍事進展往往是相一致的。……北伐進行十分迅速，吸收軍閥部隊為重要原因之一，這決非單純軍事力量所能達成，必須由政治上著手方可實現。」見劉維開，〈評介兩部關於北伐戰爭的書籍〉，收入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第7輯，頁260。

⁵ 茅盾，〈從牯嶺到東京〉，《小說月報》，第19卷第10期(上海，1928.10)，頁1141。作者在這篇文章的開頭便直接提到：「我只寫一九二七年夏秋之交一般人對於革命的幻滅。」

⁶ 呂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對新思潮的回應(1914-1924)》(臺北：中

命」的精神，成為北伐最基本的出發點；然而長久以來，這場軍事的勝利不獨是現代國家建構的基礎而已，同時也是地方社會的性質出現轉變的要因。至於地方社會怎樣進一步政治化，讓革命主張及宣傳迅速感染至各階層？

本文討論前人所忽視的一個面向，以「革命政治化」(revolutionary politicization)為焦點，探究北伐時期社會基層的影響和心態。伴隨軍事行動的展開和報刊媒體的宣傳，革命感染力從廣東一隅開始，逐漸擴散到各省的城鄉地區。由於北伐的研究汗牛充棟，限於篇幅緣故，我所關注的主題充其量只是提供一個註腳，無法涵蓋各方面內容，這是必須先行言明的。至於所謂「革命政治化」，係指革命思想及言論透過了語言、儀式等各種形式展現，經由日常生活不斷的實踐，將整個社會納入在政治的「意義之網」下，重新標舉革命的真實內容。無論支持革命也好，還是徹底反對的人，革命都變成他們一項實踐生活的綱領，不得不親身去面對。⁷以下主要嘗試將時人日記、報刊記載、官方紀錄等資料，重新回溯地方基層對北伐革命的觀感及肆應，瞭解政治局勢下文化心理的變遷與意義。

二、政治語言的社會實踐

分析北伐行動在各地造成的影響，值得留心是語言的社會實踐。特別是中國歷經「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新式媒體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到處充斥宣傳文字，尤能發揮影響力。⁸大致從 1920 年代中期起，這些來自報刊、書籍乃至其他文字書寫的許多「語言」詞彙，紛紛呈現了豐富的意涵，廣布在社會各層。它們背後分別代表著某方面政治的威權及勢力，同時造成影響。研究法國革命的史家巴克(Keith M. Baker)曾經說到：政治性語言的特色，非惟象徵某黨／某派的思想內容和主張而已，且在各方的社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總頁615。

⁷ 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著，佟德志、劉訓練譯，《革命心理學》(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總頁309。

⁸ 有關這方面的真實寫照，敏銳的讀者不妨從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959)全3冊，可以窺探一二。

會關係下，歷經游移及實踐後出現其特殊的意義。⁹以廣東國民政府來看，為了因應北伐時期新的情勢及出現的矛盾，同時爭取民眾對戰事的動員與支持，採取各種鮮明的口號和標語，用來劃清彼此身分，並傳達同情的立場，藉以籠絡，政治性語言發揮了偌大的力量。

以下試舉若干深具政治性語言例證，稍做說明。譬如以地域而言，南北之別便為時人經常談論的焦點；如有稱呼國民革命軍為「南軍」，而「北軍」代表的是北洋政府轄下各地軍事勢力。¹⁰即便是有關「北伐」口號，往往也是站在南方的立場一方來發言的，相較之下，對於北洋政府而言，多少有著「南方人打北方人」的意味。¹¹所以，各地軍事實權者相繼對抗／攻剿國民革命軍，事實上也形同天津的輿論《大公報》社評所言——根本就是一項「南征」的軍事行動。¹²因為南北之別還存有省籍情結，造成族群分裂之虞，故使用情緒性的字眼，反而有模糊了發動軍事戰爭的正當性之可能。所以，那時的有識之士警覺到如此境況而特意加以排除。例如，有位河南的讀者向報刊投書，痛斥操作南北這種用意過度明顯偏狹的觀點，認為如此鄉土地域成見甚深的色彩，反倒使得敵我之間出現相互矛盾和緊張，卻未必能夠真正讓北方民眾體察到革命的意義。該位讀者甚至還總結歷史的經驗，主張應該改以「反吳」、「反反赤」等一類口號，¹³如此才能進而擴大和鞏固北伐的社會基層影響力。其實類似的觀察絕非單一例證，也出現在李璜(1895-1991)後來的回憶中，提到北方民眾將國民革命軍視如「南

⁹ Keith M. Baker,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Essays o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7-18.

¹⁰ 歐振華著，林天如編，《北伐行軍日記》(南京：光東印務局，1931)，「1926年9月1日」條，頁8，說：「下午四時，奉令推進至麥市，燈後八時到達。麥市連哨位置于許家灣，向江西修水警戒，計自馬鞍山至麥市約三十里。該處人民守古風、尚禮義，出外者甚小〔少〕，均以耕農為業。對我軍甚歡迎，稱我軍為『南軍』，稱敵軍為『北軍』，對粵籍者尤為崇拜，其心理謂粵東是『革命策源地』也。」有關這方面具體的檢討，見羅志田，〈南北新舊與北伐成功的再詮釋〉，《新史學》，第5卷第1期(臺北，1994.03)，頁87-129。

¹¹ 〈讀者(于楓冷)之聲：關於「北伐」之兩種不同的觀念〉，《嚮導週報》，第167期(廣州，1926.08.15)，總頁1684。

¹² 〈社評：南北勢力變遷〉，《大公報》(上海)，1927年6月6日，2版。

¹³ 〈讀者(于楓冷)之聲：關於「北伐」之兩種不同的觀念〉，總頁1684-1685。

宋之對金人，把北人當著異族看待」，而「北人認為南人驕妄」，相當普遍於北方社會裡，南北鴻溝，於此可見。¹⁴

1920年代社會上運用化約的方式，給予語彙政治性的意義，不乏可見，但我們更應體認：若非北伐軍事行動的相輔相成，這些語彙的力量根本無從展現。「軍閥」一詞的指涉也是具體而微之例。從今日的角度來看，這項用語的使用不無輕蔑、非難和貶抑之意。環顧到「五·四」之後幾年，北洋政府的軍政人員和學生群體處於高度緊張的情況，前者每每將後者當作仇敵，而新學生則屢向舊勢力宣戰，促使學潮不斷應運而生。¹⁵在此起彼落的學運中，「軍閥」尤其經常被賦予負面的形象來對待。直到廣東國民政府正式發動北伐之舉前，北方的《獨立評論》和《京報》內即有高一涵(1885-1968)、吳稚暉(1865-1953)、王世杰(1891-1981)等人，特別從學理的角度來論辯何謂「軍閥」之意義。這場你來我往的筆仗，無異開啟一場「文字的戰爭」，也等同決戰境外，替實際的軍事戰爭進行宣傳，助長了社會上「反軍閥」理念，並加以定調。由於「軍閥」一詞被刻意「妖魔化」，在思想方面取得先機，嗣後廣東國民政府才能在政治和軍事上有所斬獲。¹⁶而「軍閥」陸續被予以有色的眼鏡看待後，致使北洋政府轄下的各地軍事勢力，無論善惡與否，均被視為一體，就像小說《江左十年目睹記》所言：「同一軍閥，斷分不出是非好壞來的。天下事順民者昌，逆民者亡，人心之怨毒，已至沸點，盼望南方革命軍來，有同望歲。」¹⁷

猶有過之，「軍閥」還不斷地被人拿來操弄，成為黨同伐異的工具，即連國民革命軍的內部情況也不例外。雷嘯岑(1896-1982)於北伐初期，曾任江西省政府主席李烈鈞(1882-1946)的幕僚，某次他親向李氏談及唐生智(1889-1970)為人，斥指唐氏的個性甚無禮貌，十足乃「軍閥派頭」。¹⁸我們

¹⁴ 李璜，《學鈍室回憶錄》(香港：明報月刊社，1979，增訂本)，頁248-249。

¹⁵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頁104-111。

¹⁶ 這場爭論始末請參徐勇，〈「軍閥」治下之「軍閥」學理研討——以北伐戰爭前夕一場政治與學術論戰為中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2卷第4期(北京，2005.07)，頁71-78。

¹⁷ 龍公(姚鵠雛)，《江左十年目睹記》(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4)，頁236。

¹⁸ 雷嘯岑，《我的生活史》(臺北：自由太平洋文化事業公司，1965)，頁56。

不妨試想：在當時北伐軍事行動刻正風起雲湧之際，雷嘯岑的用語可謂相當耐人尋味，不但展現了社會現實面，也凸顯出時代氛圍。他說友軍唐生智深具「軍閥派頭」，可以想見心鄙其人，不無厭惡之意；但這段資料還進一步呈顯出：凡是跟自己政見相左的對方，可能將之直斥為「軍閥」。類似情形其實頗多；像朱德(1886-1976)那時也到處公開批評李烈鈞，嘗言：「軍閥李烈鈞的信，何必理他呢！」甚至南昌市內有民眾張貼「驅逐軍閥李烈鈞」的標語，即是針對李氏作為，表達不滿的作法。¹⁹反過來說，各地軍事力量／文人／群體屢以「赤化黨」或「反赤」來號召，成為看待政敵的一項標準，甚至加以指責他們所反對的北伐軍，²⁰毋寧亦是相同的手法。

除了「軍閥」外，「階級」也是這段期間人們最廣為熟悉的政治語言。該詞彙不諱言來自西方的歷史經驗，²¹可是經過一些微妙變化，卻得到許多中國知識階層所援引，成為思考、比較國情和社會性質的課題。如同日後開啟學術討論的「社會史論戰」一樣，日常報刊雜誌也拿「階級」為題大做文章。俞頌華(1893-1947)對民初政局及社會有所觀察，指稱擺脫君主專制的統治後，領導社會的力量係「中等階級」，即為當中援用之顯例。²²至於「階級」一詞形成最風行的語詞，毋寧為各地社會關於「土豪劣紳」的批鬥運動；北伐期間最令人經常想起的，便是毛澤東(1893-1976)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²³乃倡導革命暴力和赤色恐怖最重要的文獻。然而究其實，「階級」有時口號的性質可能大於實質的意義。近人的研究甚至提到：1920

¹⁹ 所舉之例，俱見雷嘯岑，《我的生活史》，頁57、59。

²⁰ 張鐵君，《蓬然夢覺錄》(臺北：阿波羅出版社，1971)，頁135。這方面也可以用清遺民鄭孝胥(1860-1938)為例。鄭氏看到報載吳佩孚(1874-1939)政策上亦有剽竊南方國民政府的辦法，以「排外」、「護工」做為主軸，乃至張學良(1901-2001)、王寵惠(1881-1958)等論及漢口驅逐英人、收回租界之語，說「彼等皆染赤化，南北主義略同，實皆狂妄無知，殆甚義和團」，可資證明。見勞祖德整理，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2130。

²¹ 「階級」在西方歷史的發展概要，請見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Fontana, 1988), 60-69.

²² 俞頌華，〈談中等階級〉，收入葛思恩、俞湘文編，《俞頌華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頁128-133。該文發表於1926年8月10日的《東方雜誌》。

²³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收入竹內實編，《毛澤東集》(香港：近代史料供應社，1975)，卷1，頁212-214。

年代商民運動逐漸成形，係以「中小商人」打倒「買辦階級」及「大資產階級」為核心命題。問題是要如何確立這兩類「階級」的身分？無論從支持或反對者來看，都是以現實環境之需要而定，並非有其判斷的標準可言。換句話說，「階級」身分的確認關鍵在於掌握話語的主導權。任何一方政治實權者經由宣傳來打擊敵對勢力，達到政治的目的；而究竟誰是「階級」的代表，誰又具備了「階級」的資格，主要來自宣傳的影響，絕非客觀事實所可決定。²⁴

「喚醒」亦為一項 1920 年代中國政治相當有力的語言和工具。「醒」是相對於「睡」的隱喻；晚清中國受到西方負面的描述，曾紀澤(1839-1890)、梁啟超(1873-1929)、胡適(1891-1962)乃至葉楚傖(1887-1946)都曾針對「睡獅」做為形容中國國勢，提出說明或批判。²⁵而創立於 1923 年 12 月的「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後來更名為「中國青年黨」，即以「醒獅」為標籤，創辦週報，倡導國家主義，訴諸「醒」的精神。該黨成立的主要目標，一方面反抗列強帝國主義的侵略，一方面又要預防共產赤流的橫行。像是共同參與發刊《醒獅》的陳啟天(1893-1984)，自忖所編的國家主義與政策書籍，「並沒有什麼艱深的道理，只是從各方面喚醒中國人的自覺，以求國家能夠獨立，人民能夠自由，而在國際上能夠站得住而已。」²⁶至於把「喚醒」或「覺醒」做為凝聚國民精神及價值，並且推向高峰的，殊屬 1925 年 3 月 12 日孫中山(1866-1925)在北京的逝世事件。這場戲劇化的過程裡，值得注意的是孫氏有「喚起民眾」一語，²⁷將自己終身致力國民革命四十年之經驗與目的，化為國事遺囑的文字，勗勉國人。藉由孫中山個人崇高的社會地位和形象，

²⁴ 馮筱才，《北伐前後的商民運動(1924-193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4)，頁 258-260。

²⁵ 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臺北：政大出版社，2010)，頁 117-135。

²⁶ 陳啟天，《寄園回憶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頁 145。相關研究可見陳雲卿，〈中國青年黨的創見與初期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

²⁷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11，頁 639。

「醒」的意義進一步推展至民族主義認同的意涵，強化了國家及命運共同體攸關與戚之感，孫氏的夢也就因此成為所有國民的夢。²⁸

當然吾人不能忘記：「革命」同樣是這時期最受矚目的政治性話語之一。北伐期間隨著反帝國主義宣傳口號的進展，爭取外交空間也被視為是一種充滿愛國心的舉措；人們藉由掛上「革命」兩字為名，訴諸外交手段的合法性。²⁹只要任何被賦予「革命」兩字的事務，其象徵的所有行為彷彿都充滿了動力，是被人們所允許和認可的。實際上，北伐時期賦予「革命」的意義與機會幾乎無所不在，到處充斥相關新詞彙。譬如以繪畫而言，往往一般稱漫畫係屬「諷刺畫」，或籠統稱為「圖畫」。但 1926 年 5 月之際，毛澤東讓繪畫開始展現另一政治性的功能。毛氏在廣州所舉辦的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便開設有「革命畫」一課程，將做為政治宣傳一類的圖像統稱作「革命畫」。³⁰圖像於此具有傳達「革命」的意念及時代任務。然而，所謂的「革命畫」究竟又是如何來展開的？曾經擔任過該課程教學的黃鳳洲，談起其中相關的傳授內容。據他說，基於時間緊迫為由，表達「革命畫」必須有其策略。毛澤東主要運用此一通俗易懂的宣傳利器，特別要求加開晚班，配合對「階級」的認識，「教畫人物，傳授對各階級人物的形象特徵的簡單畫法和基本要求」，³¹用來強化「革命」內涵。換言之，藉由鮮明而相異的形象特徵，參加講習所的學生得以更加清楚「革命」的內容，甚至是哪些人必須被「革命」。

必須指出，「革命」一詞自晚清以來，即已大量被使用。北伐時期較為突出的倒是「反革命」之普遍運用；這個源自蘇聯布爾什維克(The Bolsheviks)之譴責性語言，具有濃烈的專斷性成分，成為判別敵我的準據。³²當「革命」

²⁸ 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xi+461, 特別是第一章的討論。

²⁹ 李恩涵，《北伐前後的「革命外交」(1925-193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總頁365。

³⁰ 王奇生，〈北伐中的漫畫與漫畫中的北伐〉，《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04年第3期(南京，2004)，頁79-89。

³¹ 黃鳳洲，〈回憶「農講所」〉，《美術》，1977年第5期(北京，1977)，頁11。

³² 近人分析「反革命」在北伐時期的發展，有時遠比「革命」還更具吸引力，類似符

的內涵愈發體認之後，人們就必須前往既定的道路行走；任何稍加遲疑或拒絕附和者，都是違反集體邏輯(collective logic)的人，並非「革命」的信徒。因此，輿論氛圍也造就了「反革命」的政治路線，只要對於「革命」的立場不夠堅定的人，便有「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嫌疑。李品仙(1892-1987)說到北伐初期，共產黨基於「聯俄容共」政策下，幾乎以「左傾才是革命」來形成信仰，而昔日國民黨老同志或被鼓動、或懼於「反革命」的帽子而噤若寒蟬。³³

瞭解這些語彙所具備的意義後，應該要強調：所有的政治語言都不是單一的「影響」，而是歷經相互社會實踐下的結果。它們陸續成為各種名詞或口號，形成「群聚」(clusters)效應，內化到日常生活裡，甚至還改變了原本的思想習慣、觀念信仰，帶來社會思想的新風貌。至於人們之所以使用和接受這些語彙，也各自有其不同立場及對象；大體說來，知識分子遠較比基層民眾更能掌控這些文字，然而「革命」訴求的讀者往往乃是知識分子，至於「階級」則針對一般基層農工來聲援。無論如何，上述的詞彙有時是悄悄地不知不覺中進行，有時則是透過一連串的公開儀式而獲得力量，經由細小涓流變成了澎湃汪洋。等到人們朗朗上口時，它早已是一波波銳不可擋的狂潮了。

三、革命儀式帶來的吸引力

國民革命軍能夠迅速獲得各地支持和歡迎，再定義「革命」是其中極為重要的因素。此處所謂的「再定義」，指的是性質本身，特別有關實踐的方面。不同於辛亥革命只是造成純粹政治層面之改變，³⁴北伐時期所展現

咒的力量，而中共當時甚至業已取得「話語控制權」。相關論證見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91-101。

³³ 李品仙，《戎馬生涯·皖疆述略》(臺北：大中書局，1971)，頁85。類似的看法可見曾省齋，《浮生掠影》(臺北：作者刊行，1975)，頁46-47。

³⁴ 魯迅(周樹人，1881-1936)對辛亥革命的看法特別能有此感受，可參詳其小說〈阿Q正傳〉。見魯迅，〈阿Q正傳〉，《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第1冊，頁72-114。

的政治文化和影響，則是全面社會性的，尤其凸顯在思想上的意義，更係如此。後來接受北伐軍收編的熊式輝(1893-1974)，一語便道破戰爭之所以能夠勝出的關鍵，說決勝點已非在軍事物質條件的多寡，而是信仰。熊氏個人有如此的觀察：

其時革命氣象蓬勃，北伐軍所恃者，祇在有主義、有革命的精神。

對於物質，未遑顧及，若論械彈與餉糧，則陳舊貧乏，難與敵較。³⁵

熊式輝特別關注到「有主義、有革命的精神」，相信跟他有類似感受的可能不止一人。為了強調主義和革命，政治儀式於是成為吸引民眾參與的有力工具。桂系最初加入廣東國民政府的北伐行列，曾經積極拉攏湖南方面的軍事力量支持，葉琪(1896-1935)是當時被派遣進入廣西視察的將領。葉氏初次造訪桂省境內，其實最感興趣的是當地許多有別以而且新穎的政治作風，諸如仿效蘇聯政治體制、發動群眾運動，乃至組織農民協會、工會、學生會等。李宗仁在他的回憶錄裡頭刻意提到這段經歷：

群眾大會經常舉行，……這些，都不是華北和長江流域各省可比。

有時我們也請葉將軍在群眾大會給我們講演，並請他指導，群眾輒報以歡呼和熱烈的掌聲。葉琪係初次見到這種熱烈的革命運動的場面，頗為感動。

針對如此的狀況，李氏甚至直截了當地告訴葉琪：「這就是革命運動啊！……我希望你們湖南也能加入我們革命陣營裡來！」³⁶仔細揣摩該段引文的鋪陳，可以瞭解到北伐為何對民眾產生吸引力。換句話說，再次「理解」革命的進程和目標，未必真正來自字義上的推敲與剖析，反倒是透過不斷地儀式(rites)展演結果而來。

而同情或認同北伐的儀式，往往先自軍隊本身出發，然後朝向普羅大眾進行宣傳。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舉辦「總理紀念週」。據學者探究，約莫在孫中山逝世後不久，江蘇開始有「紀念週」的活動；³⁷而北伐前夕的半

³⁵ 熊式輝著，洪朝輝編校，《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頁84。個別標點偶有更易。

³⁶ 引文俱見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香港：南粵出版社，1986)，頁185。

³⁷ 陳蘊茜，《崇拜與記憶——孫中山符號的建構與傳播》(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年，即1926年1月16日，廣東的中國國民黨正式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決議，要求「海內外各級黨部及國民政府所屬各機關、各軍隊均應於每星期舉行紀念週一次」，並寫入〈中國國民黨總章〉內。³⁸「總理紀念週」這套儀節經由政黨的頒布和制訂，不僅在於營造孫中山個人崇拜而已，還有藉由城鄉間民眾的操演，深化意識型態的控制功效，形成制度和紀律。³⁹在軍事行動進行的同時，紀念週無疑成為凝聚北伐軍官兵內部向心力的模式，強調時節慶典加以「革命化」之意義。果然，如此的儀式執行擴大到其他層面，即連平日北伐軍士舉行的典禮，也有類似的政治動員及儀式，陸續進行複製。像是北伐期間，部隊舉行軍事教育的開學典禮，亦沿用其次序。內容包括：(一)齊集；(二)奏樂；(三)向總理遺像行三鞠躬禮；(四)請師長宣讀總理遺囑；(五)請師長對各學員及學兵訓話；(六)請來賓演說；(七)請團長對各學員及學兵訓話；(八)禮成；(九)攝影；(十)茶會；(十一)高呼口號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十二)唱軍歌。⁴⁰

人類學家克爾澤(David I. Kertzer)曾提醒我們：注意那些儀式所發揮的效力，有時遠遠超越人們既存的認知。在歷經不斷反覆地深化過程中，人們接受的不單是儀式本身而已，甚至還「連接了過去、現在和未來，消除了歷史和時間的限制。」⁴¹可以發現，「總理紀念週」不獨讓投入軍旅的男女將身體進一步政治化，同時進而向外普及，動員至社會各層民眾，甚是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歐振華——這位加入北伐軍行列的青年，在他的《北伐行軍日記》裡有條相關記載，說明軍事行動進行的同時，紀念活動伴隨而來。在部隊完成軍事攻占而開始休整之際，擴大「舉行總理逝世三週年紀

2009)，頁203-204。

³⁸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上冊，頁370-371。

³⁹ 關於「總理紀念週」的施行及研究，詳參陳蘊茜，〈時間、儀式維度中的「總理紀念週」〉，《開放時代》，2005年第4期(廣州，2005)，頁63-81；李恭忠，〈「總理紀念週」與民國政治文化〉，《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福州，2006)，頁56-60。

⁴⁰ 歐振華著，林天如編，《北伐行軍日記》，「1926年12月13日」條，頁79。

⁴¹ David I. Kertzer, *Ritual, Politics, and Powe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9-10.

念大會，各界皆有參加，各連隊皆有製有小旗標語，到會者計達數千人。場中甚為熱鬧，由團長主席演講總理生前歷史，各官兵及各界來賓皆有演說，下午四時乃散。」⁴²

許多資料記載也提及，國民革命軍在沿途征戰中，四處受到民眾普遍地歡迎，其中不乏透過儀式來展現認同。以「革命化」做為目標而言，這同樣有著一種訴諸北伐軍事之舉合法性的功能。⁴³曾在井崗山發動農民運動的龔楚(1901-1995)，回憶北伐「行軍前都先行發動群眾，而各地農會亦自動地踴躍的幫助國軍運輸軍需糧食，農軍負責保衛後方治安，使北伐軍無後顧之憂」。龔氏看到地方百姓對於國民革命所展現的熱情，直嘆：「這種軍民合作、連成一片的情形，是中國自古以來從未有過的現象」。⁴⁴譬如，無論城市還是鄉村的人民，在距離尚遠的路程時就前來迎接國民革命軍，乃至舉辦各種提燈會、巡遊會、音樂會、歌唱會等活動，共同慶祝軍隊的抵達。這些歡迎會不僅說明地方百姓爭相迎勞的盛況，還提供軍隊平常箠食糊漿之生活所需。值得注意的是：在軍隊就地編整期間，召開群眾大會更係不可或缺的項目。至於大會主調，即每當進行至最高潮之處，官兵民眾會一齊高唱那首膾炙人口的「國民革命歌」。據傳這種熱烈情緒，感染了許多人，致使屢有「官兵感激淚下者」。⁴⁵

在群眾大會的場合上，國民革命軍的政工人員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北伐之初，廣州國府便理解到民氣對軍事的功效，要求「各軍及各級政治部應特別注意同民眾的聯繫」。⁴⁶依照「以黨領軍」、「重視政治訓練」等

⁴² 歐振華著，林天如編，《北伐行軍日記》，「1928年3月12日」條，頁244。

⁴³ 歐振華著，林天如編，《北伐行軍日記》，「1927年7月24日」條，頁149，說：「倚宿集係江蘇邳縣所管，地方商店雖有百數十間，但頗繁盛，人民智識開通。當我軍經過時，站立路邊觀看者達一、二千人，對我軍甚景仰，頗有革命化，較之山東人之愚魯，洵有天淵之別。」

⁴⁴ 龔楚著，聞堂編，《龔楚將軍回憶錄》(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頁39。

⁴⁵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頁86；歐振華著，林天如編，《北伐行軍日記》，「1927年1月1日」條，頁91；沈沛霖，《耆年憶往》(南京：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1998)，頁52-53。這首歌的歌詞是：「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國民革命成功，國民革命成功，齊歡唱，齊歡唱。」

⁴⁶ 引自1926年9月10日《廣州民國日報》曾刊載的一篇通訊。見孟·伏·岳列夫著，王啟中、周社元合譯，《北伐前後的中國革命情勢》(臺北：國防部情報局，1980)，

理念，中國國民黨在聯俄容共時期大量援引政工制度，治軍強調思想訓練，仿效蘇聯「紅軍」，建立一切為政治服務的「主義兵」。⁴⁷所以，集會每每成為政工人員揮灑政治的場域。一方面，這些「穿軍服的革命者」會以宣傳口號鼓勵官兵，提昇作戰士氣，另一方面還對基層民眾進行組織訓練，凝造革命空氣。鄧演達(1895-1931)即謂：「革命政黨的根基也必然的要建築在革命的群眾身上。」⁴⁸有關百姓的組訓，剛開始時是藉由發表演說，宣揚發動戰爭的理由，然後是對到會的民眾散發傳單，並張貼標語，教唱革命歌曲，最後召開軍民聯歡大會。類似各式各樣的「軍民祝捷遊藝大會」、「歡迎革命軍大會」，不斷反覆上演，既盛讚革命的光榮事蹟，也將革命理念輸入在社會基層的日常生活裡。於此，醒目的口號成為典型的操作儀式之一。參與過類似經驗的沈沛霖(1903-1992)指出，為了希望傳達「江西民眾的心聲」，一首專以四言為體裁的獻詞，刻意被大聲朗讀出來，讓他難以忘懷：

貴軍過境，雞犬不驚。仰視狀況，只欠糧薪。黃童白叟，無不歡迎。
秋毫不犯，諸葛復生。購買物品，交易公平。救民救國，鬼服神欽。
敬祝努力，殺盡北兵。⁴⁹

事實上，歡迎會或任何形式的遊行，除了有凝聚共識與認同的功能外，也是 1920 年代常見的一套政治統治策略，做為人們平日生活的一種規訓(displine)，甚至是文化形式。以集結民眾為基礎的「群眾法庭」，是其中最具體、訴諸民粹的表演儀式，目的用來傳達普羅百姓的「心聲」，乃至判定罪罰的標準。⁵⁰像是程天放(1899-1967)，在「四·二」事變時被共黨學生

頁181。

⁴⁷ 呂芳上，〈近代中國制度的移植與異化：以一九二〇年代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為例的討論〉，收入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臺北：編者印行，2002)，頁140-151。

⁴⁸ 鄧演達，〈我們現在又應該注意什麼呢？〉，收入周天度編，《鄧演達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頁123。有關鄧演達在政工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可參考陳佑慎，《持駁殼槍的傳教者：鄧演達與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臺北：時英出版社，2009)。

⁴⁹ 沈沛霖，《耆年憶往》，頁54。

⁵⁰ 臧勺波，〈蔣汪與我(一)〉，《春秋雜誌》，總第301期(香港，1970.01)，頁6-7。有關這類發生在湖南省集眾暴力的討論，請見張世瑛，〈罪與罰：北伐時期湖南地區懲治土豪劣紳中的暴力儀式〉，《國史館學術集刊》，第9期(臺北，2006.09)，頁44-99。

拘押，原因是他的「反革命」角色，理應就地槍決；但幸運之神卻眷顧了他，有人認為應該「由民眾法庭審判後正式槍斃」，沒想到因為如此的「堅持」，反倒使得程氏僥倖免於一死。⁵¹另外，當「寧漢分裂」的態勢逐步明朗之際，夏斗寅(1886-1951)、萬耀煌(1891-1977)兩人一度預備要糾集軍隊，申明討共，而武漢國民政府也努力積極尋求應付的辦法。當時的共產黨則是為了穩定社會人心，特意選在漢口舉辦了一個紀念紅色五月的遊行，打算以「多采多姿的遊行會，吸引社會各階級的人民前來觀看，粉飾太平，免得失業的工人及痛恨共產黨的群眾，起來暴動」。根據親臨現場的張鐵君(1899-?)描述：「回憶那天真是熱鬧極了，滿城空巷，男男女女都在街上往來參觀遊行。」如果究其實，遊行本身可能不見得具備任何慶祝的意義，充其量乃為掩蓋隨之而來的民眾恐慌心理。⁵²如同法國革命時節慶創造出來的氛圍一樣，無論歡愉還是悲痛的情緒，都是另一種政治情緒的抒發，做為動員群眾的目標。⁵³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集眾聚會、遊行毋寧也都開展成為北伐時期特殊的政治文化，且逐漸開始深化至人們的內心中。

革命儀式所導致風氣的改變，還同時反映在社會如何看待特定族群的角色定位上。先以軍人來說。由於北伐軍官兵宣稱以「不亂殺生、不搶奪」來進行軍事行動，深獲當時一般民眾的激賞與讚揚，因此西方洋人的報紙輿論皆持相當良好的印象，還特意記載南方部隊的種種光榮事蹟。不獨如此，報紙傳媒甚至把國民革命軍的活動加以渲染，描寫成一支守紀律、愛鄉民的隊伍，與北洋政府的軍隊種種可恥、專橫、野蠻的行動行徑，適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⁵⁴受到這樣的報導感染，加上屢次軍事勝利的影響，黃埔軍校學生的聲譽一天比一天升高，成為人人欽羨和仰慕的對象，⁵⁵跟以往清末民初軍人所謂「丘八」的形象迥異。帥學富(1901-1982)曾回憶自己跟隨國民革命軍進入南昌，「那時我年輕英俊，總是騎著高頭大馬，三皮五金(按：

⁵¹ 程天放，《程天放早年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8)，頁74。

⁵² 張鐵君，《遽然夢覺錄》，頁146。

⁵³ Mona Ozouf, *Festival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⁵⁴ 魏西梁科娃·阿吉莫娃，《中國兩年回憶錄》(臺北：國防部情報局，1976)，頁225-226。

⁵⁵ 李少陵，《駢廬雜憶》(臺北：黃玉琪印行，1963)，頁166-167。

「三皮」指的是皮鞭、皮帶、長統皮靴；「五金」指的是金絲眼鏡、金手錶、金戒指、金臂章、金袖扣)戎裝，一股軒昂之氣，溢於眉宇。」由於帥氏肩臂掛著少校的身分，又以革命軍勝利者的姿態出現，自然引來不少側目。他在《五車書室見聞錄》所言：

我每次演講，獲得聽眾鼓掌，可謂出盡風〔鋒〕頭。此時我是黃埔學生，漸漸為社會人士所尊敬，更為各校女生所羨慕。南昌當時民謠，即有「生為女兒身，願嫁三皮客」之句。在此一段時間，我們真是黃金時代，我經常接到素不相識的女學生來信，使我驚喜交集，茫然不知所措。⁵⁶

可以推知：演說的內容定然都是主義、黨綱等一類新的政治語言。類似帥氏經由北伐革命成為「政治新貴」，逐漸在社會上冒出地位的青年，應該很多。他們備受社會注目、得到女性芳心青睞的情形，更是想當然爾。這段引文中提到女學生來信希望結識，足可見證那時的風氣一斑。

同樣地，政治徵候的改變也吹向不同的性別之域，尤其對婦女族群而言。「解放婦女」在北伐期間也成為國民革命軍一項重要的社會實踐及口號，並且廣泛得到時人關注。在革命發源地廣州，不但先後有婦女團體從事相關運動，要求跟男子一樣享受同等權利，還隨著一連串的工運、農運等遊行，女性也開始組織婦女協會，搶占報章雜誌的版面。⁵⁷此外，傳統男女婚姻觀的束縛也開始備受抨擊，有以高呼口號「離婚結婚，絕對自由」！⁵⁸因為思想大開的結果，就連比較「保守」的人也不免受其感染。湖南省某位積極參與各項社會活動的時代新女性，提到自己向來認為行事作風較為「守舊」的舅父，亦曾經鄭重跟她說：「你為何不像別人一樣，也出外走走，

⁵⁶ 帥學富，《五車書室見聞錄》（臺北：作者印行，1971），頁97-98。

⁵⁷ 站在反對立場的北方報紙《順天時報》，便對此一婦女運動的社會現象多所著墨，並有評論。見〈廣州舉行婦女紀念會，預會五千餘人議決九項〉，《順天時報》（北京），1927年3月11日，7版；〈武漢纏足及幼女之女工，為自由平等而遊行，要求與男工同樣工資，中山夫人激勵之詞〉，《順天時報》（北京），1927年3月13日，7版；〈武漢舉行之職業婦女之遊行運動，嬌娜難行聲嘶力竭之示威，勇敢乎？抑為滑稽遊戲乎？〉，《順天時報》（北京），1927年4月7日，7版。

⁵⁸ 蝶媒，〈北伐從軍外紀〉，《宇宙風》，第32期（上海，1937.01），頁406。

活動活動，參加什麼會的，守在家內做什麼？」⁵⁹更有意思的是，婦女努力伸張自我的權利和地位，卻是歷經革命儀式後，方使平等的意義獲致彰顯，打破性別界限。譬如，報載有則談及婦女解放運動的過程，提到她們「均多數剪髮，且多著中山裝，頭帶軍帽，腳穿綁腿與皮鞋，望之儼然為少年美貌之軍官」。⁶⁰這樣爭取女性自身地位，如果以今日性別角度來看，不見得真正符合平等意涵，可是從革命帶給社會的影響而論，卻大不相同，充滿深刻意義。可以看到，一切都因革命的進行，而使得社會正在迅速轉變中。

然而，再怎麼樣革命的激情及動員，終究也有消耗殆盡的時候。儘管有形形色色的各種「宣傳」和訴求，國民革命軍的初衷仍然不免與擴大一己生存的勢力範圍密切相關。⁶¹所以，當北伐的軍事行動開始後，部隊補給工作便脫離了原來國府提供的供給，於是不得已，必須恢復自己獨立的「活動」。換言之，「活動」包括轉向民間進行徵稅，用來維持部隊平日的經費，並以擄獲敵軍的戰利品，擴充自己部隊的武器與彈藥。⁶²北伐的開始固然以鞏固信仰出發，奠定了後來軍事勝利的基礎，但同時亦造就了舊勢力的「再造」，吸納軍閥本來的權力基礎形式，故而時人頗有「軍事北伐，政治南伐」之言論。因此這段期間，在不免對民間有許多負擔和要求的形势下，為了達成支持北伐的需要，身處民間的政工人員顯得格外重要。他們的任務是繼續留下來組織民眾和成立新的政權機關。⁶³

⁵⁹ 高益君，《八十年生死苦難的回顧》（臺北：作者印行，1988），頁76。

⁶⁰ 〈漢口又傳來婦女解放運動新消息〉，《順天時報》（北京），1927年5月14日，7版。

⁶¹ 根據研究，北伐時期的宣傳樣貌非常多元，舉凡演講、報告、標語、傳單、小冊子、漫畫、總理遺像、廣告、詩歌等，都是進行宣傳的媒介。1926年5月，廣州國民政府開始準備北伐之際，當時還提出了諾言，預定當北伐完成後，要對工人與農民實施廣泛的社會改革措施。至於北伐新占領的某些產糧省區，亦對某些將軍們提出了如何分配的承諾，大家都認為北伐是可以緩和廣東的經濟緊張情況。俱見王奇生，〈北伐中的漫畫與漫畫中的北伐〉，頁79-89；歐金林，〈湖南人編寫的〈國民政府北伐歌〉〉，《文史博覽》，2003年第2期（長沙，2003），頁136-137；亞·伏·布拉戈達托夫著，王啟中、周社元譯，《論中國革命的演變》（臺北：國防部情報局，1979），頁169。

⁶² 亞·伏·布拉戈達托夫，《論中國革命的演變》，頁167。

⁶³ 魏西梁科娃·阿吉莫娃，《中國兩年回憶錄》，頁225-226。

四、槍桿子的宣傳

軍事北伐帶來的社會迴響，隨著與時俱移，在 1926 年底後開始有了種種的變化。原先國民革命軍最為倚賴的宣傳效果，雖然已經初步達到軍事征伐成效和勝利的果實，可是實際上真正成功的並非宣傳本身，而是進而透過「槍桿子下的宣傳」。誠如前述，基於對民間有諸多負擔和要求，以符合北伐軍事活動之需要，革命化的政治原則與各地社會間仍然有不少扞格與衝突。

我們可以從當時社會上普遍流傳的一句話：「黨軍可愛，黨人可殺」，窺見人們的心態一二。本來身為黨的軍隊武力，必須靠著堅信主義，謹守紀律，維持「盡力保衛民眾」的形象，如此對照於軍閥專門搶掠姦淫的惡形惡狀，更能藉此贏得百姓的愛戴與認同。不過，這樣看似「所向無敵」的黨軍，卻也不免有其弊端。北方的一家報紙便極力渲染相當不同的黨軍形象，該報聲稱黨中之人未必如是，甚至頻頻描述在地方社會上到處專橫跋扈，任意妄為，反而使得一般百姓不堪其擾。⁶⁴於是乎，呈現在反對北伐軍的勢力中，「黨」既成了進步及統一力量的源頭，也變為穩定社會秩序最大的威脅。對黨軍和黨人兩種迥異性格的描述，不惟在南方極為流行，連吳稚暉在彈劾共產黨的呈文中都曾引及。⁶⁵

接著我要先以張桐(1860-1942)的《杜隱園日記》為例，⁶⁶進一步探索北伐期間社會上有關「槍桿子的宣傳」及其意義。之所以選定這份日記的理由，原因有二：其一、此日記的作者其實是位地方鄉紳，專以教書為其志業；他並沒有真正預決過任何的國家政策與大事，卻相當熱心參與地方社

⁶⁴ 據報稱，「黨軍可愛，黨人可殺」最先可能是從漢口方面流行的。見〈黨治績略聞〉，《順天時報》(北京)，1927年2月21日，2版。北方報紙對北伐軍以負面的角度看待，這方面討論亦可見高郁雅，《北方報紙輿論對北伐之反應——以天津大公報、北京晨報為代表的探討》(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總頁288。

⁶⁵ 如此的印象引自梁啟超的家書。見梁啟超，〈致孩子們〉，收入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10冊，《家書(1927年5月5日)》，總頁6264。

⁶⁶ 此日記另有一點校本，為俞雄選編的《張桐日記》(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惟本文進行係以原稿參照進行探究，以別於當中訛誤。這裡要特別感謝羅士傑教授分享給我這份資料。

會的基層活動和事業。以思想態度來說，張桐算是一位舊派人物，同時也是位典型的士人階層。其二、由於張桐個人長期生活在溫州，該地自晚清以降便是非常重要的商業城鎮，無論移民活動和資訊皆非常流通。此外，溫州前後經歷過孫傳芳(1885-1935)軍隊和北伐軍兩個不同的統治時期，可以感受到「革命政治化」如何深入民間，成為人們不得不面對的一項課題。

仔細閱讀《杜隱園日記》，會發現北伐軍的到來，一步步改變了既存的社会信仰和價值結構。從張氏的記載裡，黨軍及其背後的整套宣傳精神和主張，促使地方社會產生一連串質性的變化：政黨的綱領剛開始是凌駕一切，到後來甚至左右了張桐的生活，令他私下深覺「黨人可殺」，於是對國民革命轉而抱持不同的態度。除了考量年齡和世代(張氏在 1927 年時已年屆 67 歲)所造成的隔閡外，衡諸他認為黨人之所以「可殺」，首要的因素是因為帶給各地民間信仰的壟斷和高壓統治。由於科學主義(scientism)在近代中國逐漸為人接受，既有的宗教或信仰有必要改弦易轍，擺脫神權的範疇，⁶⁷取而代之是符合現代國家需求的意識型態。1920 年代中期，北伐軍在一路倡行革命口號的同時，身負建立統治意識型態之需，打倒神權的空氣也跟著瀰漫，在各處造成不少騷動。例如，以祭祀孔子為主的文廟，即是這一波最先受到殃及的對象。文廟本來在地方上具有平日宗教祭祀、市集和聚會等諸項功能，同樣也是向民眾進行弘文宣化、穩定社會秩序最重要的象徵地所在，如今伴隨北伐軍事行動，以及「除魅」(disenchantment)的聲音不斷要求下，文廟被迫必須「革其命脈」，淪為抨擊和重新革除的對象。

譬如 1927 年 3 月 27 日，張桐在日記上寫道：

聖同言，杭省已有通令，孔廟、關、岳廟大祀一律廢除，且將文廟改為孫中山紀念祠。噫！三綱廢，五常減，四經弛，六賊張，宜大聖大賢之不甘受享也。⁶⁸

張氏顯然不滿意把孔子(前 551-479)、關羽(?-220)、岳飛(1103-1142)等人的民間及信仰神祇廢除，甚至抹殺了這些宗教性活動，驟改為深具政治意義的

⁶⁷ 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現代中國的國家與宗教：宗教政策與學術典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4期(臺北，2006.12)，頁169-209。

⁶⁸ 張桐，《杜隱園日記》(溫州市立圖書館藏，未刊稿)，「1927年3月27日」條。

紀念祠。他其實相當關心地方祭典與文廟能否保存，也注視著其後續發展；在北伐結束後，又再次紀錄了自己觀察下的文廟：

午飯飯後，赴大南謝池巷，便過郡大成殿，見已改為商業學校。……大成殿至聖先師牌位，亦不知遷於何處，中間竟懸掛孫文像，左右懸革命黨旗，令人對之直轟然心傷，此真千古未有之大變。⁶⁹

文廟被黨軍進駐，成為宣揚革命理念的場所，對張綱來說，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至於這樣的情況，並非突發的單一事件，歐振華的日記中也提供了一則實證。在 1926 年 12 月 6 日，為求方便起見，北伐軍刻意選擇在地方上的文廟，由全團官兵來舉行紀念週儀式，且會後各官長均有演說。⁷⁰無獨有偶，盛傳福建省福州市也在北伐軍抵達後，出現「已撤去文廟先師位，改奉孫中山」之事，引來時人喟歎。⁷¹

除了最根本的社會信仰——儒家及傳統文化外，北伐軍還進一步壓抑其他宗教活動，甚至給予「迷信」的態度看待。事實上，反教運動自晚清時期便已發其端，至民初「五·四」新文化運動更攀上高峰。但 1920 年代以後，反教活動則從純粹知識菁英的宗教辯論，進而擴大加入政黨政治的原則和色彩。不管蔡元培(1868-1940)公開「教育獨立」的聲明，或是余家菊(1898-1976)提出「收回教育權」的口號，均與此有關。⁷²北伐的軍事活動由於受到反帝的革命熱情影響，更強化了這股風潮。在最初進行軍事征服的湖南、江西兩地，國民政府即以反對帝國主義和教會信仰為由，干預民間社會的宗教組織。像是李維漢(1896-1984)回憶，他個人擔任國民黨湖南省黨部主委的期間，曾經要求教會學校取消宗教課、不讀聖經，並組織所謂「反文化侵略大聯盟」，在耶誕節日當天遊街，進行反基督教宣傳。而且，黨部也涉入農村社會的各項節慶及活動：減租、減押、減稅、禁坐轎、禁演

⁶⁹ 張綱，《杜隱園日記》，「1929年4月28日」條。

⁷⁰ 歐振華著，林天如編，《北伐行軍日記》，「1926年12月6日」條，頁79。

⁷¹ 郭曾忻，《邨廬日記》，收入國家圖書館分館編，《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北京：線裝書局，2003）第72冊，「丁卯年二月二十九日」條，編頁739。

⁷² 相關討論請參葉仁昌，《五四以後的反對基督教運動》（臺北：久大文化公司，1992），頁52-97。

花鼓戲、剪髮、放足、砸佛像和祖宗牌位運動等。⁷³如此動盪不安的「暴風雨」襲來，遂使南京、金華、蕪湖、雲南、成都、汕頭、九江、廣州等地陸續傳來教會被毀的消息，更有兩名外籍神父遇害，引來梵諦岡(Stato della Città del Vaticano)方面的抗議。⁷⁴至於黨軍則在攻克江西之後，更通令轄下各省，規定廢止春秋丁祀典禮，並將所有經費，充做各省的教育費使用。⁷⁵

張氏日記也提供了兩則相關記載。第一是瑞安當地有城隍廟神像遭人破壞，張桐頗疑係「黨部所為」。第二則係關於清明節的迎神賽事，充滿政治角力的意味，縣長更是直接被地方黨部加以打擊，意謂其中「塗面裝扮者皆是共產黨伎倆」云云，給予抹殺。⁷⁶事實上，與此雷同的事例不乏可見。當國民革命軍初抵江西省時，針對龍虎山流傳的道教張天師信仰，貴溪的縣黨部便逕去查抄天師府，把張道陵傳下的一把寶劍和一顆大印沒收，並委派一人送呈省政府。結果負責委送的人誤以為寶劍和印璽乃是無價之寶，反而藉故中途脫逃，直赴上海躲藏，打算把沒收的物件，當作奇貨可居。⁷⁷此則瑣事雖屬笑話趣談，不過也凸顯出革命軍隊究竟如何涉入地方信仰，乃至影響當地生活的程度。

誠如一位洋人觀察，「以黨領政」等各項「運動」，無疑帶來民間基層的巨變，宛如降臨一場「社會性的颱風」。⁷⁸這場颱風不僅吹倒了本來根深蒂固的農村裡人際關係與社會型態，還直接引來更複雜而多元的變動。首先，政黨成為至高無上的價值標準，舉凡與「黨」抵觸或衝突的部分，不管是思想、原則，還是學說，一律都必須被迫放棄，甚至慘遭攻蔑。挾帶黨義的人，於是得到正當性基礎，可以任意行事。張桐的日記描述某次縣長乘轎出接，卻被黨軍青年詬其「今日是何日，如何擺架子」，於是一哄多人而起，將縣長搭乘的肩輿兩架打斷，輿蓋則搗毀打碎；至於平時負責

⁷³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頁92、95-96。

⁷⁴ 劉嘉祥編著，《剛恆毅樞機回憶錄》(臺北：天主教徒會，1992)，頁144-145。

⁷⁵ 〈黨政府通令，廢止丁祭祀孔典禮，貫徹剷除封建制度〉，《順天時報》(北京)，1927年3月14日，7版。

⁷⁶ 張桐，《杜隱園日記》，「1928年3月23日」；「1928年4月6日」條。

⁷⁷ 陳公博，《寒風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1)，〈軍中環記〉，頁125。

⁷⁸ 孟·伊·嘉珊寧，《加倫將軍總顧問室》，頁152-153。

維護秩序保安的警察，也不如黨軍勢力，因為有「毆打黨軍挑夫事，亦被黨部滋鬧，勒去酒食錢小洋數百角」。張氏平時屢見類似情形，難怪要發出怒嚎，直言簡直是「大亂世界，無法無天」。⁷⁹

其次依附在黨和主義下的社會階層／族群，頓時通通獲得解放，後來導致社會不安現象，繼而改變了原來的性質。像是因為北伐而興起的農民運動，就跟過去傳統社會毫無憑依的力量迥異，它不再像以往歷史朝代中的「暴動」，而是訴諸於革命，成為要改變人類社會的「動力」。曾經參加湖南農運的一位民眾便觀察到：「過去是重要紳士先生們舉行會議，來管農民，現在世界變了，農民卻舉行會議，來管重要紳士先生們。後者除了完全服從，別無他法。」⁸⁰這段話恰巧擊中矢的，說明社會業已徹底改變既有的面貌。如果用鄭超麟(1901-1998)的話，北伐軍事行動之進行，實際也促使基層社會掀起一場「紳士大換班」，⁸¹只不過這次換的不是原來具有領導地位的鄉紳，而是新一代以黨務和主義為包裝下的「農民」。

但我們還是不該忘記：一切改變的力量都與現實利益有著千絲萬縷的關連，甚至直接和槍桿子有關；因為宣傳口號擁有了軍隊的支持，將顯得更加動力無窮。1927年5月21日許克祥(1889-1964)發動「馬日」事變之前，湖南境內農民屠殺所謂的「土豪劣紳」，造成社會動盪不安，受到矚目。這些入黨成為「社會菁英」的許多農民，他們發動「革命」行動，實施殘酷的屠殺。相同地，起而反抗的「土豪劣紳」，也依樣畫葫蘆，提出口號：「打倒農民協會，殺盡農運特派員」，進行反擊。據蘇聯顧問的記載，湘省各地攻擊農運的組織，如有下舉：

⁷⁹ 引文俱見張桐，《杜隱園日記》，1927年2月12日，未標頁碼。

⁸⁰ 引自孟·伏·岳列夫，《北伐前後的中國革命情勢》，頁278。

⁸¹ 鄭超麟著，范用編，《鄭超麟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頁115、150。

湖南地區反農運組織表

地區	反農運組織
湘鄉縣	保衛農村安寧協會
衡陽縣	保華黨
醴陵、瀏陽	三愛黨
醴陵	打狗協會
湖南中部	保產黨

資料來源：孟·伏·岳列夫，《北伐前後的中國革命情勢》，頁275-276。

他們糾結了地方冬防局、保衛隊、民團隊、警察等力量，彙整原來傳統社會的武裝組織。值得留心的是那些反農運組織的名稱，無異也是另一種「宣傳」，代表不同立場和態度。像是「保衛農村」，自然是純粹站在鄉紳地主階層的立場考量，保衛的「安寧」其實是這些人的利益；「保產」則是直接針對反共產的思想和主張而來，在宣傳方面與農運分子的目標殊異；「保華」不無投射反對帝國主義之用意，蓋共產乃沿襲自蘇俄傳來的政治思想和體制，而非傳統社會文化所固有；「打狗」則有階級蔑視和仇恨的語意存在；「三愛」源自孫傳芳的主張：愛國家、愛人民、愛敵人，高唱用來對抗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五、黨治下的「政治南伐」

「寧漢分裂」結束，南京、武漢國民政府重新整合，推行「分共運動」。國共問題暫獲解決，調整既有的軍政組織結構，並轉換對北伐的軍事行動方針。在這第二階段的北伐進程，⁸²國民革命軍內部也進行了些微的「修正」，目的在擺脫共產勢力的擴張。譬如以組織系統而言，本來由共產黨分子壟斷、深具控管思想功能的總政治部，遂更名「政治訓練部」，直接

⁸² 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臺北：作者印行，1987），頁687、689。

歸至軍事委員會的轄下指揮。這項決策遂令軍委會的職權進一步擴大，質言之，整個軍隊的權力開始集中在總司令一人——蔣介石(1887-1975)的身上，而且調整了若干行政政策。因為蔣氏相當重視政府權力對地方黨務的改造，且盡量摒除國民黨本身內部所帶來的影響及力量，於是北伐軍此後的政治工作重點，不再是主動的組織那些「光復」地區之民眾，而是改弦易轍，與當地既有的民眾團體進行合作。⁸³

細究這些「合作」，實際上在思維方面，仍以「主張革命」為精神，以「革命」來號召，深入到各個社會基層底部。有意思的是，第二階段的北伐歷程裡，國民革命軍對各地民間社會採取的係折衷辦法，既援用先前共黨組織民眾和宣傳的方式，又嘗試尋求跟地方達成某種共識，甚至運用本來即已根深蒂固的風俗習慣，做為擁護自己的力量。以下先以河南北伐的經歷為例，探究後期軍事活動中「革命政治化」的變化內容。

選擇河南省做為討論對象，主要顧及當地所具備的環境限制和資料問題。環境方面簡單地說，河南在民國時期的發展非常特殊。一方面，自清季開拓鐵路建設事業之後，該省境內因為京漢鐵路貫穿其間，在軍事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故成為兵家必爭之地；然而另一方面，優越的地理位置每每也成為軍事實權者所覬覦的對象，於是戰爭爭奪不斷，頻遭人禍，加以天災的屢傳，結果河南遂成為「光明和黑暗並存的土地」。⁸⁴而如此的交錯複雜條件，也促使該省地方武裝勢力的強化，以致於會黨、民團林立，無形中對北伐軍隊的進展，造成重大的威脅。其次有關資料部分，以下將多方徵引漢口《民國日報》的記載。該報為武漢國民政府之機關報，其中的政治部工作報告雖不無「宣傳」性質，必須斟酌其左派觀點，但足以反映「革命政治化」的意義。

跟北伐初期幾乎如出一轍，國民革命軍在河南所到之地，凡是舉辦演

⁸³ Donald A. Jorda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 251-261. 對於蔣介石在政府和政黨之間統治理念的差異，可以和黨國元老胡漢民(1879-1936)稍做區別，特別是有關後來兩人在訓政制度的認知上。見岩谷將，〈訓政制度設計を蔣介石・胡漢民対立——党と政府・集權と分權〉，《アジア研究》，第53卷第2期(東京，2007.04)，頁1-18。

⁸⁴ 語自貝思飛(Phil Billingsley)著，徐有威等譯，《民國時期的土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頁56。

講、紀念大會、軍民聯歡大會等，都是不可或缺的政治宣傳要目。另外，每當軍隊前往一處開始紮營休整時，便派員前往附近的農村，召集鄉民會談，將北伐之意義及各種可能造成不安謠言之由來，還有關於各項地方統治重要的問題，詳盡闡明，使之瞭解。1927年賀國光(1885-1969)率軍抵達河南省信陽縣，沿途經過確山、明港一帶，便「召集當地農團領袖，作最懇切之演講，力勸勿為他部匪黨所惑，致有軌外行為，各領袖皆深為感動，誓與我軍合作到底，驅除殘餘之奉軍，並派多人分途演講，感情極為融洽。」⁸⁵還有遇到比較「民智閉塞」的地區，北伐軍則進行大規模的「政治訓練」，以切身利害的問題進行闡述，努力宣傳。根據相關的工作報告指稱，如此的結果「亦足使民眾有一番的認識，疑團冰釋，日益接近於我軍」；雖然百姓不見得完全領略革命的言論，至少在鞏固基層社會和組織等方面，北伐軍可謂呈現長足的優勢。⁸⁶

教育宗旨的改變，也可以為我們說明了第二階段北伐軍事勝利及其導致政黨統治產生的結果。當1927年夏天，國民革命軍的勢力陸續到達河南時，許昌縣的教育事業亦遭受影響波及，為之一變，開始充滿「黨治」的色彩。根據1933年所出版的地方志記載：「改革伊始，首開黨義訓練班、塾師訓練班，倡辦平民學校，搜集廟產，成立管理學款委員會，增設初級小學六十餘處、平民學校一百二十餘處」，⁸⁷顯然黨化滲入到教育的系統之中。如果對照到國府在1930年通令各縣修纂方志「須注重革命事跡」的情形看來，⁸⁸許昌的個案很能代表當時風氣，顯示隨之而來的政治文化氛圍。

至於對待宗教，因應北伐情勢的變化，加上基於吸納黨員和擴大組織的需求，地方黨部改變了原有的策略，而是給予若干寬鬆的條件。在信陽縣當地，有一所大同醫院，其中有男女看護學生共五十餘人，且大多數為

⁸⁵ 〈京漢線奉軍八日全部退鄭州〉，《漢口民國日報》(北京：人民日報社，1980，影印)，1927年5月15日，1張1頁。

⁸⁶ 〈第四方面軍總指揮部政治部在西平、鄭州間工作概況〉，《漢口民國日報》，1927年7月2日，1張2頁。

⁸⁷ 朱又廉等編纂，許昌縣志總編輯室整理點校，《許昌縣志》(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卷9，「教育」，總頁385。

⁸⁸ 〈各縣修志須注重革命事跡〉，《中央日報》(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影印)，1930年7月29日，4版。

基督教徒。為了吸收這批優異的青年，縣黨部於是特別立下規定：舉凡基督教徒想要入黨，必須發表宣言，表明自己脫離基督教。後來這個辦法充分奏效，結果該院學生有多人遵行，以明脫離教會，組織第五區分部。⁸⁹不獨對於基督教如此，連傳統的宗教信仰亦復如是。1927年8月，負責地方黨務工作的胡長怡(1905-?)聽聞家鄉河南省陳留縣正在推行「打神毀廟」活動，力求突破除迷信，要以廟產來撥辦教育。他深感「多年古蹟毀於一旦，亦不無可惜」，故爰請接手辦理，創設學校。但是，胡氏的父親曾警告他「鄉人迷信太深，一言毀廟，恐阻撓太大，不如縮小範圍試辦，俟有成績再行擴大。」於是胡長怡先聘請地方鄉紳出面協調，用意減少阻力，又費盡唇舌，勸說民眾。不料當中百姓的反抗仍舊，只得稍作妥協：

經過多日籌備，費盡千辛萬苦，雖唇焦舌敝，仍難破除善男信女之迷信，成群結隊，阻撓拆廟打神，甚至散播流言，搖惑聽聞。為減少阻力工作順利起見，允許保留神像，隔以木板，經大體整修，始得勉強開學。⁹⁰

這個例證同時可知：北伐事業雖以黨治進行，對地方社會極富影響力，然而與過去不同，卻採取一種合作協調的模式，不再以高壓的統治，做為達成目標的前提。

如此兩手的統治策略，還展現在對待會黨的民間組織上。譬如「紅槍會」，係近代中國地方社會的秘密結社與民間會黨之一。該會結合宗教的理念，從晚清的義和團蛻變而來，蔓延於魯西、蘇北、皖北及河南境內，在民國時期擁有相當的群眾基礎和實力。⁹¹北伐軍事活動之初，紅槍會甚至被共產黨視為潛入農村的政治通路和最有希望的革命組織。儘管紅槍會有其「迷信的信條」與色彩，但它們仍有可能發展成為「農民協會的武裝力

⁸⁹ 〈北伐中工作經過(續)〉，《漢口民國日報》，1927年6月20日，2張6頁。

⁹⁰ 引文俱見胡長怡，《雲海蒼蒼——翁如七三自述》(臺北：華欣文化事業中心，1986)，頁150-152。

⁹¹ 枕薪，〈河南之紅槍會〉，《國聞週報》，第4卷第24期(天津，1927.06)，頁1。有關紅槍會的起源和發展，尚可見末光高義，《支那の秘密結社と慈善結社》(臺北：古亭書屋，1975，影印)，頁113-114；長野朗，《土匪・軍隊・紅槍會》(東京：支那問題研究所，1931)，頁366-374；戴玄之，《紅槍會(一九一六～一九四九)》(臺北：食貨出版社，1973)，頁9-10。

量」，故而共黨相當留心對該組織的滲透，並且相當成功。⁹²

第二階段北伐工作的前夕，國民革命軍寄望順利達成軍事和政治目標，紅槍會也是不容忽視的力量來源。尤其多次戰爭之中，紅槍會會眾儼若「小政府」的姿態，屢為地方民眾倚靠的勢力，不管是參與抵抗稅捐，甚至和國民革命軍間發生衝突，都可見得他們組織上的嚴密。⁹³因此，許多前線軍隊紛紛進行調查紅槍會的實際情況，擬出政治工作報告，及建議如何應對的策略。例如指稱：該會眾使用的武器，「以古武之刀矛為最多。此種刀矛，欲持之以對抗槍炮，明知無能，故會中領袖，遂假借神權，念符施咒，倡言槍彈不能入肉，一以樹立會眾對領袖之信仰，以提起會眾不怕死之精神，故會首對於會眾，一呼百應，會眾對於會首，極為信仰。」又云：「各地紅〔槍〕會份子複雜，鄉土觀念甚深，各自為戰，無一定之主張，亦無一定之目標，專以排外以及取得敵人之槍械為事。」「紅槍會之群眾，雖大半為農民，但其領袖則地主紳士階級及失意軍人，實佔多數，會首假借紅會之名義，乘戰事之機，向軍閥報効，改組為軍旅別動隊等等名稱，聞吳佩孚因此編有紅槍會一師。」關於信陽縣黨部之調查，「農民對於黨的認識印象頗深，然已受土豪劣紳之慫恿挑撥者，則懷疑如故；黨部人員，對於黨的工作，頗為努力，但以了解黨義的黨員頗少，故發展力量不甚顯著。」⁹⁴

這些調查報告，使得北伐各軍深知：紅槍會或其他會黨的指揮權多由地方士紳控制，實際參與作戰的人則是貧苦農民，故而必須調整作戰策略。正如同相關的研究指出，為了宣揚北伐理念，河南地區的軍事進行不似廣

⁹² C. 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ien-ying, eds., *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6), 303-305.

⁹³ 像是洛陽一帶農團，因抗捐抗稅，與張治中(1890-1969)的軍隊發生衝突，紅槍會則集眾十萬人，向張部隊進攻，施行包圍，且有一部軍隊繳械，張有數列兵車逃往鄭州。可見紅槍會勢力之巨。見〈奉逆擬退開封，豫西農團與張治公衝突〉，《漢口民國日報》，1927年5月21日，1張1頁。「小政府」的說法源自Odoric Y. K. Wou, *Mobilizing the Masses: Building Revolution in Hen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62-63.

⁹⁴ 引文俱見〈國民革命軍第四方面軍總指揮部政治部在信陽、遂平間工作概況〉，《漢口民國日報》，1927年5月28日，2張4頁。

東、湖南各省，並非「以組織農民對抗地主劣紳減租減息為目標，而是組織農民對抗軍閥為目的。」⁹⁵像是第四軍卅五團宿營在確山縣北七堡一帶，負責政治工作的人員即與「黃沙會」的領袖接洽，努力宣傳民眾與革命軍合作之必要。據說該地領袖為了表示擁護國民革命軍北伐，特別召集各村莊民眾，召開盛大的歡送會。計到會的武裝民眾約有八百餘人，長矛短刀，燦爛森嚴，威風之氣象迥異其常。報紙形容當時的場景為：

旗幟樹立，隨風飄動，同時兩相高呼掌聲如雷之際，即由該會領袖張文學主席登台宣布開會，略謂：「革命軍就是老百姓，老百姓就是革命軍，革命軍是專門替窮苦的老百姓打不平的。」

接著由相關領袖分致答詞和演說，酬答之中尤能嗅得革命空氣極為濃厚。透過革命加持的儀式，展現軍民感情和合作之精神。⁹⁶

值得留意，北伐軍最終目標仍然訴諸於黨的領導，並將主義信仰做為不可超越的唯一綱領。配合革命政治化的原則，黨軍在地方社會上的進行仍然持續發揮影響。據在河南的十一軍十師報告：東洪橋附近有紅槍會會眾五萬人邀請講演，該部隊曾派兩人前往，以寨門樓做為講台，除宣傳外，並教以呼口號。饒富趣味的是，該部隊決定進行政治宣傳時，要改變對紅槍會以往一貫只是稱讚的態度，取而代之以黨為尊。工作報告甚至提及作法：「毫不客氣的告訴他們非受黨的領導不可，並實指幫助革命軍的方法。」⁹⁷

支持黨所領導的原則，還可以組織「河南義勇隊」之經過為例。當時第四軍總指揮唐生智及中央特派員于樹德(1894-1982)，鑑於即將向奉魯軍閥進行軍事攻擊，又恐河南境內的盜匪遍野，乘機擾亂地方治安，故要求吸納地方武力，做為後盾，成立義勇隊，保護各縣治安。根據報載，義勇隊的目的係以「保護各縣地方之治安，破壞奉魯軍後方聯絡，以及鎮壓反革命」為由而組織，尤其值得措意是希冀結合「農民自衛軍，以及紅學各道門學友中贊助革命、一致討奉〔軍〕、願遵守本條例組織者」，歡迎加入。⁹⁸

⁹⁵ 佟以群，〈國共合作時期河南農民運動之研究(1925-1927)〉(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頁155。

⁹⁶ 〈革命空氣瀰漫中之河南〉，《漢口民國日報》，1927年5月16日，1張2頁。

⁹⁷ 〈十一軍十師政治部在前方之工作〉，《漢口民國日報》，1927年6月10日，1張2頁。

⁹⁸ 〈國民革命軍組織河南義勇隊〉，《漢口民國日報》，1927年5月23日，1張2頁。

因此，總結後期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工作，雖然革命的原則未變，可是卻採取了因時制宜的辦法。這從蔣介石對賀國光上陳的作戰方針裡，要求各級官長切實研究，便能知曉。其中，關於宣傳之效的部分，蔣氏明示「宣傳標語須合乎北方民眾心理」，原因是「北方民眾智識尚未開通，不僅有南北之界限，并〔並〕久受敵人煽惑，誤認我均為赤化」，故宣傳應注意「使其了解三民主義入手」。此外，要「切忌用激烈標語」，理由是避免觸及動搖地方社會基礎的力量：

去歲革命軍在河南作戰，人民起初不反對，迨見打倒大地主、打倒土豪劣紳等激烈標語，及強迫男女剪髮，遂致引起反對，遍地暴動，危及後方，幾經解釋，始了其事。其原因北方紅槍會，各村落皆有；而其首領，無一非豪強紳富及大地主也。此次北伐，宜通囑各軍政治部，將此種標語口號暫行免去，以免激起反感。⁹⁹

這樣一來，改弦易轍且兼具妥協意義的北伐行動，則讓「革命」不再是原來的「革命」，而變成前述茅盾所說「一切理想中的幸福都成了廢票」。當「革命」只是一句口號，而非實踐的綱領，那麼革命的意義便蕩然無存。

而北伐妥協政策下熱誠的質變，也使得許多人驚覺到：儘管還在呼喊高唱「革命」，可是那些抬轎子的人業已換成另外一批。一直跟隨在蔣介石身邊的陳誠(1898-1965)，日後曾總結道：「三民主義促成了北伐的成功，而北伐的成功卻帶來了三民主義的沒落，這真是匪夷所思的一大諷刺」。¹⁰⁰陳氏對於當時盛傳「軍事北伐，政治南伐」的流言，感受頗深；他在1930年中原大戰醞釀爆發前夕，私下向友朋說：

北伐時，總司令每到一處都有很多人歡迎，現在也是如此。從表面上看去，似乎並無兩樣；但實際則大不相同。從前歡迎的人多是普通老百姓；現在則幾乎盡是軍政人員和地方士紳，很少有老百姓。從前老百姓爭來歡迎他，是誠心擁戴；現在這些人歡迎他，是懼怕他或討好他。由此，可見老百姓對革命的態度，已由信心、熱望而

⁹⁹ 這段公文收錄在歐振華著，林天如編，《北伐行軍日記》，「1928年4月21日」條，頁267。

¹⁰⁰ 何智霖編輯，《陳誠回憶錄：北伐平亂》（臺北：國史館，2005），頁88。

退到冷淡的邊緣了。¹⁰¹

陳誠的話或許最能反映民間此時冷、彼時熱之景況。有意思的是，換了批人還是繼續把「革命」的口號掛在嘴邊。

最後且讓我舉胡長怡書中一實例，略述北伐完成前如此的「黨治」僵化情形。1928年初，原屬山東舊軍閥的陳耀漢(1889-?)，將部隊投效改編後，不久遇上了第一次總理紀念週的舉行。那時也是小同鄉的政訓處主任劉儒霖，特別詢及紀念週該如何進行。由於雙方對話及施行紀念週過程的內容生動有趣，不妨在此全引，以為結尾：

劉主任問道：「從前做過紀念週沒有？」陳師長答道：「沒有。」劉主任又言道：「既沒有做過，恐官兵對紀念週的意義還不明白，須先做解釋，使官兵均能明瞭，師長講或是儒霖解？」陳師長回答道：「我來講。」劉主任恐師長也不很清楚，遂又道：「師長如需要資料或講稿，由政治部擬好送來。」陳師長笑道：「不需要。三民主義我已看過好幾遍了。」於是我們就告辭回處，未再為師長準備講稿。

星期一上午九時，隊伍調齊，陳師長、劉主任上台。陳師長任主席，余任司儀，行禮如儀，請主席訓話。陳向總理行禮，即對官兵訓示道：「今天我們第一次做紀念週，但紀念週的意義，想大家還不明白，我必須先為大家講解清楚。可是其意義很高深，尤其是這個『週』字很不好講。講得深了，你們龜孫不懂，必須舉幾個淺顯的例子，方可解釋明白。『週』就是週而復始，也就是自然循環的意思。比如：『雞雞』二十一，『鴨鴨』二十八，『鵝鵝』一百零五純，這都是天理循環的奧妙。總理去世，我們每週一開會紀念他，下週一還是開會紀念他，永遠不斷的紀念他，這就是做紀念週的意義。」「我今天講的話，你們大家都聽得懂嗎？」大家一齊高聲應道：「聽得懂。」其實還是不懂。陳師長又言道：「你們既是都懂了，下次紀念週，我抽問你們的時候，那個答不出來，可是要揍人啊！」講了半天，紀念週的真義，一點也未講明白。

¹⁰¹ 黃宇人，《我的小故事》(香港：吳興記，1982)，頁204-205。

目睹了發生經過的胡長怡感想是：「其實陳師長的舊底子並不算壞，初參加革命行列，對革命的新知識太貧乏。……師長如此，其他官兵的政治知識，不問可知矣。」¹⁰²

六、結論

1928年底東北易幟，北伐完成。這場軍事的勝利讓整個中國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變。至少對許多人而言，新的語言詞彙伴隨軍事、組織、媒體等「武器」，迅速到各社會底層，迫使他們必須想辦法適應這突如其來的轉變。有的人找尋各種可能生存的方法，謀求他道；有的人則是處在驚慌之下，不知所措，頻頻發出痛不欲生之感。一位隱居在北京陋巷的老輩便說：「前此辛亥名為種族革命，亦為政治經濟之革命，然老生宿儒偷息其間，遺秉滯穗，尚不至盡絕生路；若此次革命，則文學之大革命，且一革將無復興之望矣，可哀也！」¹⁰³從語境方面來講，他用的「文學」二字，當係指「文化」而言。雖然歷史學者何炳棣(1917-)沒有像舊派人物那樣，有著今日時不我與的時代感，但也透露了「革命」所賦予的社會新現象：

軍閥內戰期間城鄉不靖，不時有「土匪」被捕殺頭。……這種傳統的「野蠻」，北伐成功後就不再見了。我十歲以前，與清末還能連接得上的一些民間禮俗、社交稱謂等等，也隨著北伐「打倒列強，除軍閥；國民革命成功，齊歡唱」這類口號歌曲很快地消逝了。¹⁰⁴

經由這段話可知：軍事行動有意無意使得既有的傳統社會風俗習慣、人倫民情，在高舉革命的這張大旗下洗滌殆盡。

當然誠如本文所述，以「革命」為口號的「黨治」，早在北伐謝幕前悄悄產生變化，失去了原來革命的熱情和精神。但進行軍事征服的國民政府一方，已將革命成功輸入到中國社會每處角落。無論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從北伐經驗中瞭解了對群眾運動的運用和基礎的認識。相關的研究便提

¹⁰² 引文俱見胡長怡，《雲海蒼蒼——翁如七三自述》，頁159-161。

¹⁰³ 郭曾斯，《邨廬日記》，「戊辰年七月十二日」條，編頁841。

¹⁰⁴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臺北：允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頁32。

到：中共依附在國民黨內，歷經多方對民眾施行宣傳與帶動，從中學習和實驗如何鼓動群眾情緒的伎倆；至於對國民黨而言，則自一連串的軍事征服裡，領略到暴民之不可恃，從而戒慎提防。¹⁰⁵後來 1932 年 1 月，「政學系」的楊永泰(1880-1936)參與圍剿中共之工作，向雷嘯岑徵詢關於擬定地方治理之法條。他用了一個譬喻說明自己的立場和態度：「我想社會上各界人士，有時皆可以跟共產黨妥協，唯有土豪劣紳是共黨的死對頭。我們擬利用地方上的土劣勢力來打擊共黨，卻不可為土劣所利用。雷先生既是過來人，很希望領教領教。」¹⁰⁶楊氏的想法，非惟說明國共雙方在北伐經驗傳承後，繼續衍生而互相競爭的歷史課題，同時也讓吾人看到了另一遺產——地方社會業已在北伐期間經歷了革命政治化之洗禮。

¹⁰⁵ Donald A. Jorda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 228.

¹⁰⁶ 雷嘯岑，《我的生活史》，頁88。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一)報刊、檔案、方志、文集、日記、回憶錄

1. 《大公報》，天津：大公報社。
Da gong bao, Tianjin: Da gong bao she.
2. 《中央日報》，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影印。
Zhong yang ri bao, Nanjing: Jiangsu gu ji chu ban she, 1994, ying yin.
3. 《國聞週報》，天津：國聞週報社。
Guo wen zhou bao, Tianjin: Guo wen zhou bao she.
4. 《順天時報》，北京：順天時報社。
Shuntian shi bao, Beijing: Shuntian shi bao she.
5. 《漢口民國日報》，北京：人民日報社，1980，影印。
Hankou min guo ri bao, Beijing: Ren min ri bao she, 1980, ying yin.
6. 《廣州民國日報》，廣州：廣州民國日報社。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Guangzhou: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she.
7. 《嚮導週報》，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影印。
Xiang dao zhou bao,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54, ying yin.
8.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
Zhongguo di 2 li shi dang an guan, bian. Zhongguo guo min dang di yi, er ci quan guo dai biao da hui hui yi shi liao, Shang ce. Nanjing: Jiangsu gu ji chu ban she, 1986.
9. 朱又廉等編纂，許昌縣志總編輯室整理點校，《許昌縣志》，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Zhu, Youlian, deng bian zuan, XuChang xian zhi zong bian ji shi, zheng li dian xiao. Xuchang xian zhi, Zhengzhou: Zhong zhou gu ji chu ban she, 1987.
10. 竹內實編，《毛澤東集》，香港：近代史料供應社，1975。
Zhu, Neishi, bian. Mao Ze dong ji, Xianggang: Jin dai shi liao gong ying she, 1975.
11. 周天度編，《鄧演達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Zhou, Tiandu, bian. Deng Yanda wen ji,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81.

12. 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Liang, Qichao, zhu, Zhang Pinxing, zhu bian. *Liang Qichao quan ji*, Beijing: Beijing chu ban she, 1999.
13. 陳公博，《寒風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1。
Chen, Gongbo. *Han feng ji*, Taipei: Han jing wen hua shi ye you xian gong si, 1991.
14. 葛思恩、俞湘文編，《俞頌華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Ge, Sien, Yu Xiangwen, bian. *Yu Songhua wen ji*, Beijing: Shang wu yin shu guan, 1991.
15.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Guangdong sheng she hui ke xue yuan li shi yan jiu shi, zhong guo she hui ke xue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zhong hua min guo shi yan jiu shi, zhong shan da xue li shi xi sun zhong shan yan jiu shi, he bian. *Sun Zhongshan quan j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86.
16. 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
Lu, Xun. *Lu xun quan ji*, Beijing: Ren min wen xue chu ban she, 1956.
17. 張綱，《杜隱園日記》，溫州市立圖書館藏，未刊稿。
Zhang, Gang. *Du yin yuan ri ji*, Wenzhou shi li tu shu guan cang, wei kan gao.
18. 郭曾炘，《邗廬日記》，收入國家圖書館分館編，《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第72冊，北京：線裝書局，2003。
Guo, Cengxin. *Bing lu ri ji*, shou ru guo jia tu shu guan fen guan, bian, *Zhong hua li shi ren wu bie chuan ji*, di 72 ce, Beijing: Xian zhuang shu ju, 2003.
19. 勞祖德整理，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
Lao, Zude, zheng li, Zhong guo li shi bo wu guan, bian. *Zheng xiao xu ri j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93.
20. 歐振華著，林天如編，《北伐行軍日記》，南京：光東印務局，1931。
Ou, Zhenhua, zhu, Lin Tianru, bian. *Bei fa xing jun ri ji*, Nanjing: Guang dong yin wu ju, 1931.
21.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臺北：允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He, Bingdi. *Du shi yue shi liu shi nian*, Taipei: Yun chen wen hua shi ye you xian gong si, 2004.
22. 何智霖編輯，《陳誠回憶錄：北伐平亂》，臺北：國史館，2005。
He, Zhilin, bian ji. *Chen Cheng hui yi lu: bei fa ping luan*, Taipei: Guo shi guan,

- 2005.
23. 李少陵，《駢廬雜憶》，臺北：黃玉琪印行，1963。
Li, Shaoling. *Pian lu za yi*, Taipei: Huang yu qi yin xing, 1963.
 24.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香港：南粵出版社，1986。
Li, Zongren, koushu, Tang Degang, zhuan xie. *Li Zongren hui yi lu*, Xianggang: Nan yue chu ban she, 1986.
 25. 李品仙，《戎馬生涯·皖疆述略》，臺北：大中書局，1971。
Li, Pinxian. *Rong ma sheng ya, Wan jiang shu lue*, Taipei: Da zhong shu ju, 1971.
 26.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
Li, Weihuan. *Hui yi yu yan jiu*, Beijing: Zhong yang dang shi zi liao chu ban she, 1986.
 27. 李璜，《學鈍室回憶錄》，香港：明報月刊社，1979，增訂本。
Li, Huang. *Xue dun shi hui yi lu*, Xianggang: Ming bao yue kan she, 1979, zeng ding ben.
 28. 沈沛霖，《耆年憶往》，南京：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1998。
Shen, Peilin. *Qi nian yi wang*, Nanjing: Jiangsu wen shi zi liao bian ji bu, 1998.
 29. 亞·伏·布拉戈達托夫著，王啟中、周祉元譯，《論中國革命的演變》，臺北：國防部情報局，1979。
Ya Fu Bu la ge da tuo fu, zhu, Wang Qizhong, Zhou Zhiyuan, yi. *Lun zhong guo ge ming de yan bian*, Taipei: Guo fang bu qing bao ju, 1979.
 30. 孟·伊·嘉珊寧，《加倫將軍總顧問室》，臺北：國防部情報局，1977。
Meng Yi Jia shan ning. *Jia lun jiang jun zong gu wen shi*, Taipei: Guo fang bu qing bao ju, 1977.
 31. 孟·伏·岳列夫著，王啟中、周祉元合譯，《北伐前後的中國革命情勢》，臺北：國防部情報局，1980。
Meng Fu Yue lie fu, zhu, Wang Qizhong, Zhou Zhiyuan, he yi. *Bei fa qian hou de zhong guo ge ming qing shi*, Taipei: Guo fang bu qing bao ju, 1980.
 32. 帥學富，《五車書室見聞錄》，臺北：作者印行，1971。
Shuai, Xuefu. *Wu che shu shi jian wen lu*, Taipei: Zuo zhe yin xing, 1971.
 33. 胡長怡，《雲海蒼蒼——翁如七三自述》，臺北：華欣文化事業中心，1986。
Hu, Changyi. *Yun hai cang cang: Xi Ru qi san zi shu*, Taipei: Hua xin wen hua shi ye zhong xin, 1986.
 34. 茅盾，〈從牯嶺到東京〉，《小說月報》，第19卷第10期(上海，1928.10)。
Mao dun. "Cong gu ling dao dong jing," *Xiao shuo yue bao*, di 19 juan di 10 qi (Shanghai, 1928.10)。

35. 高益君，《八十年生死苦難的回顧》，臺北：作者印行，1988。
Gao, Yijun. *Ba shi nian sheng si ku nan de hui gu*, Taipei: Zuo zhe yin xing, 1988.
36. 張鐵君，《蘧然夢覺錄》，臺北：阿波羅出版社，1971。
Zhang, Tiejun. *Qu ran meng jue lu*, Taipei: A po luo chu ban she, 1971.
37. 陳啟天，《寄園回憶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Chen, Qitian. *Ji yuan hui yi lu*, Taipei: Taiwan shang wu yin shu guan, 1965.
38. 曾省齋，《浮生掠影》，臺北：作者刊行，1975。
Ceng, Shengzhai. *Fu sheng lue ying*, Taipei: Zuo zhe kan xing, 1975.
39. 程天放，《程天放早年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8。
Cheng, Tianfang. *Cheng Tianfang zao nian hui yi lu*, Taipei: Chuan ji wen xue chu ban she, 1968.
40. 黃宇人，《我的小故事》，香港：吳興記，1982。
Huang, Yuren. *Wo de xiao gu shi*, Xianggang: Wu xing ji, 1982.
41. 黃鳳洲，〈回憶「農講所」〉，《美術》，1977年第5期(北京，1977)，頁11。
Huang, Fengzhou. "Hui yi 'nong jiang suo'," *Mei shu*, 1977 nian di 5 qi (Beijing, 1977), 11.
42. 雷嘯岑，《我的生活史》，臺北：自由太平洋文化事業公司，1965。
Lei, Xiaocen. *Wo de sheng huo shi*, Taipei: Zi you tai ping yang wen hua shi ye gong si, 1965.
43. 熊式輝著，洪朝輝編校，《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
Xiong, Shihui, zhu, Hong Chaohui, bian jiao. *Hai sang ji: Xiong Shihui hui yi lu*, Xianggang: Ming jing chu ban she, 2008.
44. 臧勺波，〈蔣汪與我(一)〉，《春秋雜誌》，總301期(香港，1970.01)，頁6-7。
Zang, Shaopo. "Jiang wang yu wo (1)," *Chun qiu za zhi*, zong 301 qi (Xianggang, 1970.01), 6-7.
45. 劉嘉祥編著，《剛恆毅樞機回憶錄》，臺北：天主教主徒會，1992。
Liu, Jiexiang, bian zhu. *Gang heng yi shu ji hui yi lu*, Taipei: Tian zhu jiao zhu tu hui, 1992.
46. 蝶媒，〈北伐從軍外紀〉，《宇宙風》，第32期(上海，1937.01)，頁406。
Die Mei. "Bei fa cong jun wai ji," *Yu zhou feng*, di 32 qi (Shanghai, 1937.01), 406.
47. 鄭超麟著，范用編，《鄭超麟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
Zheng, Chaolin, zhu, Fan Yong, bian. *Zheng Chaolin hui yi lu*, Beijing: Dong fang chu ban she, 2004.
48. 龍公(姚鵬雛)，《江左十年目睹記》，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4。

- Long gong (Yao yuan chu). *Jiang zuo shi nian mu du ji*, Beijing: Wen hua yi shu chu ban she, 1984.
49. 魏西梁科娃·阿吉莫娃，《中國兩年回憶錄》，臺北：國防部情報局，1976。
Wei xi liang ke wa A ji mo wa. *Zhong guo liang nian hui yi lu*, Taipei: Guo fang bu qing bao ju, 1976.
50. 龔楚著，聞堂編，《龔楚將軍回憶錄》，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
Gong, Chu, zhu, Wen Tang, bian. *Gong chu jiang jun hui yi lu*, Xianggang: Ming bao yue kan she, 1978.
51. Wilbur, C. Martin and Julie Lien-ying ed.. *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6.

(二)研究工具書、專著

1.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刊介紹》，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959。
Zhong gong zhong yang ma ke si en ge si lie ning shi da lin zhe zuo bian yi ju yan jiu shi, bian. *Wu si shi qi qi kan jie shao*,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58-1959.
2.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Wang, Qisheng. *Ge ming yu fan ge ming: she hui wen hua shi ye xia de min guo zheng zhi*, Beijing: She hui ke xue wen xian chu ban she, 2010.
3. 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著，佟德志、劉訓練譯，《革命心理學》，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Le Bon, Gustave., zhu, Tong Dezhi, Liu Xunlian, yi. *Ge ming xin li xue*, Changchun: Jilin ren min chu ban she, 2004.
4. 末光高義，《支那の秘密結社と慈善結社》，臺北：古亭書屋，1975，影印。
Suemitsu, Takayoshi. *Shina no himitsu kessha to jizen kessha*, Taipei: Gu ting shu wu, 1975, ying yin.
5. 呂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對新思潮的回應(1914-192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
Lu, Fangshang. *Ge ming zhi zai qi: zhong guo guo min dang gai zu qian dui xin si chao de hui ying (1914-1924)*, Taipei: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1989.
6.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1994。

Lu, Fangshang. *Cong xue sheng yun dong dao yun dong xue sheng: min guo ba nian zhi shi ba nian*, Taipei: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1994.

7. 李恩涵，《北伐前後的「革命外交」(1925-193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Li, Enhuan. *Bei fa qian hou de "ge ming wai jiao" (1925-1931)*, Taipei: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1993.

8. 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臺北：作者印行，1987。

Li, Yunhan. *Cong rong gong dao qing dang*, Taipei: Zuo zhe yin xing, 1987.

9. 貝思飛(Phil Billingsley)著，徐有威等譯，《民國時期的土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Billingsley, Phil, zhu, Xu Youwei, deng yi. *Min guo shi qi de tu fei*, Shanghai: Shanghai ren min chu ban she, 1992.

10. 長野朗，《土匪·軍隊·紅槍會》，東京：支那問題研究所，1931。

Nagano, Akira. *Dohi, guntai, kōsōkai*, Tōkyō: Shina mondai kenkyū sho, 1931.

11. 高郁雅，《北方報紙輿論對北伐之反應——以天津大公報、北京晨報為代表的探討》，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

Gao, Yuya. *Bei fang bao zhi yu lun dui bei fa zhi fan ying: yi tian jin da gong bao, bei jing chen bao wei dai biao de tan tao*, Taipei: Taiwan xue sheng shu ju, 1998.

12. 陳佑慎，《持駁殼槍的傳教者：鄧演達與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臺北：時英出版社，2009。

Chen, Youshen. *Chi bo ke qiang de chuan jiao zhe: Deng Yanda yu guo min ge ming jun zheng gong zhi du*, Taipei: Shi ying chu ban she, 2009.

13. 陳蘊茜，《崇拜與記憶——孫中山符號的建構與傳播》，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

Chen, Yunqian. *Chong bai yu ji yi: Sun Zhongshan fu hao de jian gou yu chuan bo*, Nanjing: Nanjing da xue chu ban she, 2009.

14. 馮筱才，《北伐前後的商民運動(1924-193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4。

Feng, Xiaocai. *Bei fa qian hou de shang min yun dong (1924-1930)*, Taipei: Taiwan shang wu yin shu guan, 2004.

15. 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臺北：政大出版社，2010。

Yang, Ruisong. *Bing fu, huang huo yu shui shi: "xi fang" shi ye de zhong guo xiang xiang yu jin dai zhong guo guo zu lun shu xiang xiang*, Taipei: Zheng da chu ban she, 2010.

16. 葉仁昌，《五四以後的反對基督教運動》，臺北：久大文化公司，1992。
Ye, Renchang. *Wu si yi hou de fan dui ji du jiao yun dong*, Taipei: Jiu da wen hua gong si, 1992.
17. 戴玄之，《紅槍會(一九一六～一九四九)》，臺北：食貨出版社，1973。
Dai, Xuanzhi. *Hong qiang hui (1916-1949)*, Taipei: Shi huo chu ban she, 1973.
18. Baker, Keith M.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Essays o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9. Fitzgerald, John.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0. Jordan, Donald A.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76.
21. Kertzer, David I. *Ritual, Politics, and Powe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22. Ozouf, Mona. *Festival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3. Waldron, Arthur. *From War to Nationalism: China's Turning Point, 1924-192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4. Williams, Raymond.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Fontana, 1988.
25. Wou, Odoric Y. K. *Mobilizing the Masses: Building Revolution in Hena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三)期刊論文、專書論文、學位論文

1. 王奇生，〈北伐中的漫畫與漫畫中的北伐〉，《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第41卷第3期(南京，2004)，頁79-89。
Wang, Qisheng. "Bei fa zhong de man hua yu man hua zhong de bei fa," *Nanjing da xue xue bao (zhe xue, ren wen ke xue, she hui ke xue)*, di 41 juan di 3 qi (Nanjing, 2004), 79-89.
2. 李恭忠，〈「總理紀念週」與民國政治文化〉，《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福州，2005)，頁56-60。
Li, Gongzhong. "'Zong li ji nian zhou' yu min guo zheng zhi wen hua," *Fujian lun tan (ren wen she hui ke xue ban)*, 2006 nian di 1 qi (Fuzhou, 2005), 56-60.
3. 岩谷將，〈訓政制度設計を蔣介石・胡漢民対立——党と政府・集権と分権〉，《アジア研究》，第53卷第2期(東京，2007.04)，頁1-18。

- Iwatani, Nobu. "Kunsei seido sekkei wo Shō Kaiseki, Ko Kanmin tairitsu: tō to seifu, shūken to bunken," *Ajia kenkyū*, dai 53 kan dao 2 ki (Tōyō, 2007.04), 1-18.
4. 徐勇，〈「軍閥」治下之「軍閥」學理研討——以北伐戰爭前夕一場政治與學術論戰為中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2卷第4期（北京，2005.07），頁71-78。
- Xu, Yong. "'Jun fa' zhi xia zhi 'jun fa' xue li yan tao: yi bei fa zhan zheng qian xi yi chang zheng zhi yu xue shu lun zhan wei zhong xin," *Beijing da xue xue bao (zhe xue she hui ke xue ban)*, di 42 juan di 4 qi (Beijing, 2005.07), 71-78.
5. 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現代中國的國家與宗教：宗教政策與學術典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4期（臺北，2006.12），頁169-209。
- Goossaert, Vincent. "Xian dai zhong guo de guo jia yu zong jiao: zong jiao zheng ce yu xue shu dian xing,"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ji kan*, di 54 qi (Taipei, 2006.12), 169-209.
6. 張世瑛，〈罪與罰：北伐時期湖南地區懲治土豪劣紳中的暴力儀式〉，《國史館學術集刊》，第9期（臺北，2006.09），頁44-99。
- Zhang, Shiyang. "Zui yu fa: bei fa shi qi Hunan di qu cheng zhi tu hao lie shen zhong de bao li yi shi," *Guo shi guan xue shu ji kan*, di 9 qi (Taipei, 2006.09), 44-99.
7. 陳蘊茜，〈時間、儀式維度中的「總理紀念週」〉，《開放時代》，2005年第4期（廣州，2005），頁63-81。
- Chen, Yunqian. "Shi jian, yi shi wei du zhong de 'zong li ji nian zhou'," *Kai fang shi dai*, 2005 nian di 4 qi (Guangzhou, 2005), 63-81.
8. 歐金林，〈湖南人編寫的〈國民政府北伐歌〉〉，《文史博覽》，2003年第2期（長沙，2003），頁136-137。
- Ou, Jinlin. "Hunan ren bian xie de 'guo min zheng fu bei fa ge'," *Wen shi bo lan*, 2003 nian di 2 qi (Changsha, 2003), 136-137.
9. 羅志田，〈南北新舊與北伐成功的再詮釋〉，《新史學》，第5卷第1期（臺北，1994.03），頁87-129。
- Luo, Zhitian. "Nan bei xin jiu yu bei fa cheng gong de zai quan shi," *Xin shi xue*, di 5 juan di 1 qi (Taipei, 1994.03), 87-129.
10. 呂芳上，〈近代中國制度的移植與異化：以一九二〇年代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為例的討論〉，收入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臺北：編者印行，2002。
- Lu, Fangshang. "Jin dai zhong guo zhi du de yi zhi yu yi hua: yi 1920 nian dai guo min ge ming jun zheng gong zhi du wei li de tao lun," in *zhong hua min guo shi liao*

yan jiu zhong xin, bian, *1920 nian dai de zhong guo*, Taipei: bian zhe yin xing, 2002.

11. 劉維開，〈評介兩部關於北伐戰爭的書籍〉，收入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7輯，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

Liu, Weikai. "Ping jie liang bu guan yu bei fa zhan zheng de shu ji," in Zhang Yufa zhu bian, *Zhong guo xian dai shi lun ji*, di qi ji, Taipei: lian jing chu ban shi ye gong si, 1982.

12. 佟以群，〈國共合作時期河南農民運動之研究(1925-1927)〉，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Tong, Yiqun. "Guo gong he zuo shi qi Henan nong min yun dong zhi yan jiu (1925-1927)," Jiayi: Guo li zhong zheng da xue li shi yan jiu suo shuo shi lun wen, 2007.

13. 陳雲卿，〈中國青年黨的創見與初期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

Chen, Yunqing. "Zhong guo qing nian dang de chuang jian yu chu qi fa zhan," Taipei: Guo li Taiwan shi fan da xue li shi yan jiu suo shuo shi lun wen, 1988.

Revolutionary Politicization of Local Society during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1926-1928

Lin, Chih-hung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revolutionary politicization” (革命政治化)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grass roots and popular mentalities during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Previous scholarship has traced the victory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Army to its political slogans and propaganda. I here offer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s involved.

There is no doubt that political language(s) and revolutionary rituals aided in attracting people and encouraging participation in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With the deepening of military operations, the army shook grass roots religious and social beliefs, which led to a widespread view that “the party’s soldiers are nice, but the party’s cadres can kill” (黨軍可愛，黨人可殺). In order to gain more support, in the later stages of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the army began to adjust its strategies to accommodate different “revolutionary” forces, which led to the satiric view of “militarily a Northern Expedition, but politically a Southern Expedition” (軍事北伐，政治南伐).

In these military activities, “revolution” became a new social phenomenon which everyone had to face and practice in everyday life. It wa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that the Kuomintang and Chinese Communists alike learned how to use the power of the mass movement for “party rule” (黨治) in the future.

Keywords: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of Chinese, revolution, political culture, doctrine fetishism